

2000至2025年我国村民婚俗观念变迁简评

张志豪¹, 胡新萍¹, 黄杰^{2*}

1. 北京农学院文法与城乡发展学院, 北京 102206

2.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068

DOI:10.61369/HASS.2026040041

摘 要 : 本文基于2000–2025年间关于我国农村婚俗观念变迁的核心文献, 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与主要发现。研究发现, 二十五年来村民婚俗观念经历了从礼俗传统到市场理性的深刻转向, 表现为婚姻支付逻辑货币化、婚房需求刚性化、婚恋决策个体化和婚配策略的竞争化。同时, 高额彩礼、婚姻挤压、代际冲突等问题日益凸显, 婚俗改革与基层治理也在持续探索。本文提出“观念变迁的三重逻辑”——经济理性扩张、个体意识觉醒与结构性约束并存, 并指出现有研究在微观观念探析、跨区域比较、数字时代新形态等不足, 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关 键 词 : 村民婚俗观念; 彩礼变迁; 婚姻支付; 代际更替; 婚俗改革

A Brief Review of the Changes in Rural Marriage Customs Concept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5

Zhang Zhihao¹, Hu Xinping¹, Huang Jie^{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2206

2. Fisheries Science Institute,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Beijing 100068

Abstract : Based on core literature on the evolution of rural 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5,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key findings in this field. The study reveals tha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villagers'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customs have undergone a profound shift from traditional ritual practices to market-driven rationality, manifested in the monetization of marriage payments, rigid demands for marital housing, individualized decision-making in marital relationships, and competitive approaches to marriage selection. Meanwhile, issues such as exorbitant bride prices, marital pressur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ompting ongoing exploration of marriage customs reform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e paper proposes a "threefold logic of conceptual change" —the coexistence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expansion, heightene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and identifies gaps in current research regarding micro-level conceptual analysis,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s, and emerging patterns in the digital age, while outlining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 villagers' marital customs concepts; evolution of bride price; marital payment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ition; reform of marital customs

引言

2000到2025年, 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化加快、人口大范围流动、互联网普及、性别比例失衡因素交织, 对农民的婚姻观念和婚俗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天价彩礼、因婚致贫、光棍危机现象常见, 是认识农村社会心态和治理的窗口。

学界从宏观描述到近几年来对彩礼功能、婚房压力、代际策略、婚俗治理的分析, 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本文以2000年到2025年为时间范围, 对村民婚俗观念变迁研究进行梳理, 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供以后的研究者参考。

作者简介:

张志豪 (2003.06–), 北京农学院文法与城乡发展学院, 农村发展专业, 研究生;

胡新萍 (1980.06–), 北京农学院文法与城乡发展学院, 副教授;

通讯作者: 黄杰 (1983.03–),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一、婚姻支付的货币化与婚房的刚性化

（一）从“物”到“币”：彩礼逻辑的根本转换

彩礼属于婚俗中的主要支付环节，它的形式及意义的改变最能体现村民婚俗观念的变化。张春艳、李凤英（2009）指出^[1]，当代婚俗变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金钱取代实物”。刘嘉辉（2025）又将彩礼的功能分为补偿性、象征性和保障性^[2]。彩礼从最初的补偿性功能（补偿女方家庭劳动力损失）、象征性功能（确认婚姻关系）到现在的保障性功能（给新家庭提供启动资金）、甚至竞争性功能（在婚姻市场上展示支付能力）。

陈映彤（2026）提出，从办嫁妆到要彩礼的变化^[7]。传统父系家庭制度中嫁妆是女方家庭给女儿的财产转移，体现的是女方家庭的责任和体面，而当代农村彩礼的飞涨，恰恰是女方家庭在婚姻交换中地位发生根本转变的反映，即由原来的“嫁女赔钱”变成了现在的“嫁女获益”，其背后既有父系继嗣逻辑，又有市场稀缺性逻辑的叠加。

李涛（2025）对1980年以后农村婚姻支付的系统梳理发现，货币化进程在2000年之后明显加快^[5]，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即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性别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方，货币化彩礼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二）从“有房住”到“城里房”：婚房门槛的跃升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流动部分，婚房是婚姻支付的固定部分，而且后者成了更大的负担。王建、唐一静（2025）提出婚房进城这一概念^[4]，指出农村男性青年婚姻缔结的一个刚性趋势，在县城或者地级市有住房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农村家庭缔结婚姻的入场券。这把传统的村落内婚配规则变成了城市化门槛筛选规则，把农村青年的婚姻机会同城镇住房市场联系起来。

两位学者认为婚房进城不是个人意愿所决定的，而是由结构的力量推动的，女方家庭把城里有房看作是保证女儿婚后生活品质、社会地位、安全感的硬指标，。结果就是农村家庭代际负担急剧增加，父母把所有积蓄给儿子买婚房，成了当今农村最普遍的代际资源转移方式之一。

二、婚恋观念的分化与代际张力

（一）个体化转向：“为自己结婚”还是“为家庭结婚”？

村民婚俗观念的变化主线就是由“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慢慢移位的过程。王歌雅（2006）对我国婚姻伦理变迁的研究显示^[14]，在改革开放以后，个人的婚姻自由度大大提高，婚姻中的“情感基础”被不断突出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家庭观念完全消失。在当代农村中，典型的张力状态就是，年轻人把婚姻看成是个人感情和生活的体现，而父母辈看重的是婚姻对家庭延续的意义以及社会评价的功能。

李涛（2025）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在很多农村青年的婚恋观念里存在着一种“混合逻辑”，即他们一方面希望有自由恋爱、自主选择婚姻的现代模式，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家庭的期望、彩礼的要求、面子的竞争这些传统因素的影响^[5]。由此产生了一种

“协商型个体化”的特点，即个人的决定空间变大了，但是对于大额支付等重要的婚姻决定来说，还需要家庭的共同决定或者家庭的主导。

（二）婚姻挤压下的“错位竞争”与大龄困境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性别比例失衡，使得部分男性无法娶妻而产生的现象，也是认识当今村民婚俗观念变迁不能忽视的结构性因素。万若（2026）以贵州B村为个案，提出了“错位竞争”的概念，准确地描绘出了农村大龄男性青年的婚配策略^[6]，在婚姻市场上，“优胜者”拥有本地适龄女性资源之后，剩下的大龄男性只能“降维”去寻找婚姻的机会，即到更远的地方、离异女性、丧偶女性、跨国婚姻等地方。该种“错位竞争”策略的调整本身就是观念变迁的体现。

万若认为错位竞争深层次的困境就是经济成本的急剧增加，大龄男性婚姻困境已经不再仅仅是个情感问题，它成了一个家庭经济体系层面的压力。

（三）婚姻功能弱化与观念的“祛魅”

刘中一（2011）认为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婚嫁习俗越来越具有形式保留、意义变化的特点^[15]。近些年来，这样的情况更加明显。刘腾飞（2024）等人发现，在一些农村青年当中，婚姻的“必需品”色彩变淡了^[11]，不婚、晚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婚姻与生育之间的联系减弱，离婚的社会污名也降低了。婚姻祛魅的过程就是观念变迁中最有根本性的一个方面。

三、婚俗治理：国家介入与基层实践

（一）从道德倡导到制度约束

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婚俗问题越来越引起政策的重视。牛强（2023）、李丽霞（2025）、焦舜阳（2024）等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乡风文明建设”的背景之下，对农村婚俗治理的多种探索上。实践中形成了两种治理路径，即柔性路径和刚性路径。柔性路径就是依靠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典型示范等手段来推动移风易俗，刚性路径是部分地方出台关于彩礼标准、宴席规模的硬性规定，并辅以惩罚措施^{[8][9][10]}。

武新宇（2025）对山东省Y县婚俗改革的个案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婚俗改革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困境^[2]，村规民约缺少法律强制力、“变相彩礼”无法监管、群众“随大流”心理难以打破等等。单悦（2024）对南北方农村彩礼的比较研究也指出，治理策略要考虑到地域文化上的差别^[13]，不同的地区彩礼的功能、议价逻辑就大相径庭，“一刀切”的政策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治理悖论：禁止中的变通与反弹

宋景玉（2025）认为如果政策对于公开的彩礼数额加以限制的话，那么一些家庭就会采取“私下转账”、“附加条件”的方式来规避这一规定^[12]。更微妙的是，政府介入的时候反而加强了彩礼的协商筹码性质，即当明确彩礼上限的时候，女方家庭就会把“政策底线”当作新的议价参照点，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实际支付的金额。

该发现有重大的政策意义，婚俗治理要同经济扶持、性别平等促进、公共文化供给等更多的乡村振兴措施一起推进。

四、整合评析与个人观点

（一）已有研究的主要贡献

综上所述，在2000年到2025年间，村民婚俗观念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概念工具的精细化。由笼统的天价彩礼批评到把彩礼区分为补偿功能、保障功能、竞争功能，再到提出“错位竞争”“婚房进城”“办嫁妆到要彩礼”概念。第二，解释框架的建立。研究者把微观的婚俗变化嵌入到宏观的社会转型图景中来，把市场的货币逻辑、城镇化的空间逻辑、性别失衡的人口学逻辑、代际更替的文化逻辑等看作理解婚俗观念变迁的几块透镜。第三，对于治理实践的及时掌握。学界及时开展评价性的研究，发现国家主导型婚俗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二）研究局限与学术空白

第一，对观念的穿透力不够。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行为的变化，例如彩礼金额的高低、婚房的修建、婚礼仪式的变化等，对于行为背后观念的微观运作机制的研究还很浅。

第二，缺少区域比较。单悦（2024）的南北方比较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总体上来说，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一个村落或者县的个案上，缺少了系统的跨区域比较。

第三点是对于新形态的忽视。对于云相亲、直播征婚、彩礼众筹等新的婚俗观念新形态等数字时代婚俗观念新形态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三）个人观点：观念变迁的三重逻辑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整合和反思，笔者试图提出一个分析村民婚俗观念变迁的“三重逻辑”框架，即村民婚俗观念变迁具有三个方面的逻辑。

第一重就是经济理性逻辑。市场化进程把“算账”当作婚俗

决策的主要思想，彩礼被看作是女方家庭损失的补偿，婚房被看作是婚姻的基本保障，婚姻本身带有投资和风险规避的色彩。这就解释了婚俗变迁大体上是货币化、物质化的。

第二重是个性化的逻辑。年轻村民对于婚姻的选择看重的是“我愿意”，而不是“家庭要”，把感情契合、个人生活质量当成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在乡村社会里推进这一逻辑是有限度的、非线性的，大部分村民还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混合心态”当中。

第三种就是结构的限制逻辑。不论是高额彩礼还是婚房进城，都不是单纯的观念开放或者保守的问题，而是在性别比失衡、城乡发展差距、就业机会不平等刚性结构的塑造下形成的。

单纯强调经济逻辑容易陷入经济决定论的误区，夸大自然理性婚俗作用；单纯地强调个体化的逻辑会忽略农村社会代际权威和面子竞争的现实；单纯强调结构约束可能失去对观念自身能动变迁的敏感。好的分析应该是在三者的交集处发现具体机制。

五、研究展望

未来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第一是对于村民婚俗观念“微观纹理”进行质性研究，采用访谈和生命史的方法可以发现观念内在的矛盾以及动态调整的过程；第二是开展跨区域文化的比较，找出中国农村婚俗观念变化的一般规律及地方特色；第三是关注数字媒介、人口流动、经济波动等新的变量怎样不断改变婚俗观念；第四是政策研究方面探索观念治理的有效途径，即怎样通过公共文化供给、性别教育、社区再造等手段，从根本上改变高彩礼、高攀比的认知基础。

村民婚俗观念的变迁，并不可以简单用道德尺度来评判，它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深层次的转型。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是在于接近这个复杂的真面目。

参考文献

- [1] 张春艳, 李凤英. 关于中国当代婚俗变迁的思考 [J].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7(06): 53-57.
- [2] 武新宇. 山东省 Y 县婚俗改革问题研究 [D].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2025.DOI: 10.27793/d.cnki.gsds.2025.000014.
- [3] 刘嘉辉. 农村彩礼的功能与变化研究 [D]. 吉林大学, 2025.DOI: 10.27162/d.cnki.gjlin.2025.001033.
- [4] 王建, 唐一静. 婚房进城: 农村男性青年的城镇住房与婚姻缔结 [J]. 当代青年研究, 2025, (03): 117-132.
- [5] 李涛. 1980 年以来农村婚姻支付变迁研究 [D]. 南宁师范大学, 2025.DOI: 10.27037/d.cnki.ggxsc.2025.000777.
- [6] 万若. 错位竞争: 农村大龄青年的婚配策略及困境——基于贵州 B 村的经验考察 [J]. 江汉学术, 2026, 45(02): 66-78.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26.02.007.
- [7] 陈映彤. 从办嫁妆到要彩礼: 父系家庭视角下的农村婚姻交换变迁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6, (05): 54-61+82+119.DOI: 10.19633/j.cnki.11-2579/d.2026.0051.
- [8] 牛强. 乡风文明建设背景下农村婚俗治理研究 [D]. 安徽农业大学, 2023.DOI: 10.26919/d.cnki.gannu.2023.000260.
- [9] 李丽霞. 乡风文明建设背景下甘谷县农村移风易俗研究 [D]. 西北民族大学, 2025.DOI: 10.27408/d.cnki.gxmzc.2025.000079.
- [10] 焦舜阳. 乡风文明建设背景下农村婚俗文化健康发展的研究 [D]. 安徽农业大学, 2024.DOI: 10.26919/d.cnki.gannu.2024.001166.
- [11] 刘腾飞. 婚俗改革中政府职能履行的困境和对策研究 [D]. 中央民族大学, 2024.DOI: 10.27667/d.cnki.gzymu.2024.000278.
- [12] 宋景玉. 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新婚俗建设研究 [D]. 浙江海洋大学, 2025.DOI: 10.27747/d.cnki.gzjhy.2025.000060.
- [13] 单悦. 婚俗改革背景下南北方农村地区彩礼现状及对比研究 [D]. 上海海洋大学, 2024.DOI: 10.27314/d.cnki.gsscu.2024.001051.
- [14] 王歌雅. 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 [D]. 黑龙江大学, 2006.
- [15] 刘中一. 乡村社会变迁场景中的婚嫁习俗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1, (05): 88-94.DOI: 10.20074/j.cnki.11-3586/f.2011.05.009.